

# 第一章

## 中国先秦兵家思想的发展 定位与中国传统文化

长期以来，人们只要谈起中国的传统文化，想到的往往就是儒、墨、道、法等思想流派，认为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尤其是儒家，其地位被抬的更高，被认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骨干之所在。这种提法甚至在东南亚地区更为突出。先秦兵学的地位比起这些“显学”来，显然有自惭形秽之感，即便是比较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虽然不否认先秦兵学的杰出贡献，但也往往将之与儒、墨、道、法各家分开看待，甚至于有的人还将兵家视作异端。

实际上，先秦兵家的思想发展与先秦的这些重大流派——儒、墨、道、法各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互补、互利的关系，充分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意识中的包容与兼通的特质。而且在古代，不乏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融通兵、儒。明代的李贽就曾提出了“吾独恨其

不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也”<sup>①</sup> 这种不同凡响的见解。

那么，为什么在现代入眼里，先秦兵家的地位下降如此之快呢？关键就在于中国古代辉煌千余年的兵学在清季没落了。而今，在新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尤其是现代知识经济的世纪挑战摆在所有有识之士的面前的时候，再回首这段历史，我们将不会忘记先秦兵学在时代的潮流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更不会忘记从中汲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搏击的思辩体系与操作原则。

## 一 先秦兵家源流释证与整体定位

### 1 先秦兵家的缘起

兵家的定义多是约定俗成。在古代典籍中，比较明确具体地谈论兵家的见诸《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

《汉书·艺文志》指出：

兵家者 盖出古司马之职 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耀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者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

<sup>①</sup> 《孙子参同·自序》。

政杨仆摭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文，命任宏论次兵书四种。

《隋书·经籍志》指出：

兵者，所以禁暴静乱者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周官》大司马“掌九法九伐以正邦国”，是也。然皆动之以仁，行之以义，故能诛暴静乱，以济百姓。下至三季，恣情逞欲，争伐寻常，不抚其人，设变诈而灭仁义，至乃百姓离叛，以致于乱。

这两段文字的主要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大致包括两层意思：溯源、定性。即兵家是源于周官大司马，约在春秋时期开始形成独立的流派。同时还包含了对于先秦兵家的基本评价。

一方面追溯甚早，充分认识了兵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深受儒家“义战”理论的影响，对于春秋战国以前的战争以极其浓厚的理想色彩加以描述，把战争区分为“义战”与“不义之战”两大类。所谓“义战”，按儒家的理解，就是拯民于水火之中，吊民伐罪，为实施仁政开辟道路，并将其视为军事斗争的理想境界。所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并进而指出，“义战”顺乎天道而应乎民心，因此必定是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甚至根本无需通过真正的战斗。并据此逻辑推理得出结论，从事“义战”，就是用兵上的最理想境界，是任何战争指导者都应该执著追求的战争宗旨。这种按自己的主观愿望，对战争的性质和宗旨加以理想化的虚拟，把原本是残酷、可怖的战争改造成合乎自己政

治理想的事物，显然是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战争目的论和战争方法论。

至于该通过何种手段才能达到这种境界，主张“义战”的理想人物是不曾也不屑于从军事操作层面去考虑的，而认为只要在政治上贯彻实施仁政就可以了；而春秋战国时期所面临的是战争频繁、杀戮惨重的痛苦现实，根本就无法回避，迫使其回复到现实中来，不得不重视对军事问题的思考和探讨。这样讲求战胜攻取之道，注重掌握驾驭战争的实际本领的军事家流派也就应运而生，这就是兵家兴起的大背景，也是其形成学派的必要的前提条件。

## 先秦兵家的流派分野

2 兵家是一个有确定含义的概念，目前所见的诸多书中将之随意地扩大、滥用，使得其与先秦诸家几乎无甚区别，也无特色。这种揉杂诸家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但是若一味地拘泥于兵家，一则其他诸家的优秀的论兵思想似必被摒弃，二则兵家自身发展的脉络也不甚清楚。所以一要澄清兵家的涵盖，抓住主流；二要析源明变，兼及诸家。

班固在《汉书》中对于“兵家”流派进行了分类。根据《兵书略》，大体上划分为四大流派，即兵权谋、兵阴阳、兵形势和兵技巧。

兵权谋 13家，259篇。（原注云：“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曷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

权谋者，以正守国，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兵形势 11 家，92 篇，图 18 卷。

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以轻疾制敌者也。

兵阴阳 16 家，249 篇。

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

兵技巧 13 家，199 篇。

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

刘光贲注释说：“阴阳技巧皆以辅权谋用形势 阴阳尤遁于虚，流于幻，不如技巧之真确可据。序之于先者，本孟子天时不如地利语也 阴阳即天时 地利即形势 人和则兼权谋、技巧也。”对于“兵家”四派的关系 他议论道：“兵分四家 以权谋为体 形势、阴阳、技巧皆其用。权谋兼治国在内 孟子所谓人和 荀子所谓附民也。形势有地利 故曰兼 阴阳即天时 故曰包 技巧则用兵之本事也 故曰用”<sup>①</sup>。

这里以兵形势为例试加分析兵家的特征。

对于“兵形势家”，班固在《汉书》中共列有 11 部著作，存留至今的只有《尉缭子》一部，其余都已经亡佚了。参证《尉缭子》，可以探讨出班固的所谓“兵形势家”的具

① 《二十五史补编·前汉书艺文志注》。

体涵义。班固对于“兵形势家”的定义是这样的：

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

这里指出了“兵形势家”用兵的主要特征可用“威、快、灵、巧”四个字来概括，即兵锋威凌天下，兵速机动快捷，兵法灵活机巧。显然，这里的特征与“兵权谋家”、“兵技巧家”有异曲同工之处，但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其侧重点有所异同。从总体上分析，兵权谋侧重的显然是在运筹帷幄的庙算前提下的以谋为先，兵技巧侧重的显然是以强大武力为后盾的重体能、兵器的技巧，而“兵形势家”强调的是在以威凌人的前提下的谋与巧。著名学者吴如嵩同志从《尉缭子》分析出发，曾指出“兵形势家”的特色有三个方面，即未战之前的对敌优势，强调拥有军事实力，建立战前对敌优势；将战之时的作战布势，强调精心运筹决胜，造成最佳战场布势；既战之后的凌敌威势，强调临阵审时度势，充分发挥击敌威势。

从兵形势家我们可以看出：先秦兵家具有系统完整性、思辩深密性、操作灵活性等特征，如何正确地加以运用，显然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 先秦兵家的重新认识与整体定位

3 关于先秦兵家的流派及著作的数量现今已难于具体细致地统计分析了。但通过《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关于《兵书略》的记载，我们还大致可以领略到先秦兵家鼎盛时期的夺人风采。

根据班固《兵书略》的统计，先秦兵家四派合计 53 家，

789篇，数目可谓相当可观。但存留至今的情况则不尽如人意。仅以兵形势这一派而言，班固在《汉书》中共列有 11 部著作，存留至今的只有《尉缭子》一部，其余都已经亡佚了。在现今保存下来的先秦兵书中，最为基本的，或者称得上代表性的著作不过数家而已。这里对于先秦兵家的探讨，基本上以《武经七书》<sup>①</sup>中的《孙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为主再加上《孙臆兵法》<sup>②</sup>，适当的吸取同时代其他诸家论兵的优秀思想。既梳理出兵家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又可澄清兵家的确定内涵，抓住主流，兼及诸家。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刘）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列述了儒（53家）、道（37家）、阴阳（21家）、法（10家）、名（7家）、墨（6家）、纵横（12家）、杂（20家）、农（9家）、小说（15家）“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

① 《武经七书》是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从我国浩瀚的兵书中筛选出并颁行武学（军事学校）必读的七部兵书，即《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和《唐李问对》。南宋高宗时，曾指定《武经七书》为选拔将领考试内容之一，可称得上是我国古代军事著作的代表之作。

② 《孙臆兵法》即《汉书·艺文志》中所载的《齐孙子》，但《隋书·艺文志》中已不见此书目，断定其已于东汉末年失传，故《武经七书》中未加收录。宋以后也多人疑其为伪书或认定其已与孙武之书合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与《孙臆兵法》，使这桩公案才得以澄清。

十四篇。”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也。

这里需要引起注意，或者值得思考的是：何以刘歆的《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都没有将兵家列入诸子？显然不是兵家本身不重要，至少诸子十家中“小说家”被视作不人流，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已足以说明问题了。

诸子十家剔除农家、小说家，显然都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更多地侧重于政治与礼法。兵家既非六艺之流裔，又兼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范畴。而《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精确地点化出政治礼法与军事战争鼎足之势的并峙与重要。兵家地位之重要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历史上考察，早期原始氏族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极低，生活水平也很低，没有战争，更没有对战争组织、指挥、战略等军事活动的需要。随着私有财产、私有观念的产生和发展，逐渐引起了部落间的相互掠夺，由集体争斗发展到由小到大的部落间的战争，从而萌发了后世战争的雏形。随着奴隶制的发展，战争的规模和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春秋战国期间，诸侯之间的争霸战争将关于战争的技巧、经验，乃至系统的思想萌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些军事经验、思想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专门的思想学派，即中国先秦兵家思想——独立的、专门以讲究战胜攻守之道的思想学派。

中国古代的兵学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由一些零散、不成系统的军事观点与思想，逐渐发展到战国时期形成较为系统的兵家思想的理论体系。第二阶段从秦、汉至唐安史之乱。这是中国古代兵家思想形成完整理论体系，进入分支学科研究并加以深入探讨的时期。第三阶段从唐中叶至明清，由变化到衰落时期。

这里需要分析的是第一阶段，即先秦兵家阶段，在整个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中所占有的地位问题。

中国古代治兵思想从萌芽、零散，发展形成基本理论体系的关键人物是孙武。仔细考辨先秦思想流派的发展变化，应该说治兵之学是从孙武开始，经吴子、尉缭子等的发展，才大体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兵家思想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奠基之作——《孙子兵法》一书则从原则、制度、思维模式、精神实质、行为规范以及世界观意义上设计了一套理论模式。不仅浓缩了前此所有的有关战略技巧的精华，而且更是一种充满了哲理思辩的人文策略，突出了以智计为先的操作主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兵之学的主要奠基者是孙武。他从当时军事实践的特点出发，总结了战争指挥实际情况的经验，加以凝炼和升华，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兵家思想体系，成为这一时期治兵之学的旷世经典。

第二阶段从秦、汉至唐中叶（安史之乱以前）。这是中国古代兵家思想形成完整体系，并逐渐进入分支学科研究的时期。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汉前的兵家思想可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等流派，可以说是概括了兵家从事兵战的全过程，即策划与决策、形势判断与运用、环境影响、武器装备等。用今天的观点来说，兵权谋相当于运筹决策，兵形势家则注重过程的具体运作，如此

等等。西汉王朝时期的兵家思想出现了多种倾向，其中占据主流的是以张良为首的汉初兵家，其代表人物在继承、整理先秦兵家流派学说的基础上，概括性地提出了“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并形势，包阴阳，用技巧也”<sup>①</sup>的理论基础和操作手段。同时，将先秦兵家的思想又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

这种丰富和发展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提出了“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的用兵之法及指挥原则，同时又强调“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助者也”的外在环境和条件的作用。尽管其中夹杂一些荒诞迷信的东西，但将先秦兵家思想从对立统一、矛盾转化的哲学高度，概括了兵战行为特点、运作过程的超常规性，从而将兵法思想提高到一新的境界。

第三阶段是唐中叶以后，乃至明清时期，基本上是属于上升发展时期，只是在清后期逐渐开始萎缩。而作为封建社会发展分水岭的安史之乱（755~763），在引起社会巨大变革的同时，也同样在社会内部的军事机制方面引起了巨大的变化。由尚智求巧逐渐转向规范化和程式化。

从上述这些分类的说明中可以看出，先秦兵家处于奠基创业的阶段，而且也的确是构建了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基本框架及理论体系，并加以具体运用与发展，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源头。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先秦兵家思想的包容性、哲理性和深邃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缩影，是极其重要的，其地位与作用不容忽视。

应该说，在春秋初期兴起的专门讲究战胜攻取之道的学派，其实质还在于以智为先。纵观历史发展的长河，在农业

① 《汉书·艺文志》。

经济时代的战争，以冷兵器的运用为主，强调的还是作战双方的体能和技巧，心智巧妙的“计”虽运用不多，但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时期的智计还不能完全归结为知识的积累，但已经反映出了知识的威力。进入到工业经济时代，来福枪、机关枪的出现，导致阵地防御与散兵作战等新的军事斗争形式的出现，这时期强调的往往不是计，而更重要的是策划性的谋。进入到信息时代，高科技、知识密集性要求更多的谋与计。

从某种程度而言，随着历史跨入 21 世纪，中国古代的兵家，尤其是作为源头的先秦兵家思想的魅力不仅没有丧失，相反，正逐渐引起世人更大的关注。这就是我们研究先秦兵家的意义之所在，也是其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运用发展的根本原因。

## 二 “兵家”与诸家的交融与异化

### 1 兵家与先秦诸家的区别——构筑理想境界与讲求操作功能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显然占据比较显赫的地位，可称得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先秦诸子中的显流。至于“兵家”，影响于今天文化的作用力显然远逊于前者。

分析诸子与兵家之间论兵最大的区别在于崇尚人本精神与执著功利原则的对立，从而决定了在军事思想方面的差异——即追求用兵思想境界和讲求用兵操作功能的分歧。

崇尚人本精神的诸子学派，包括儒、墨、道等学派，总是要按自己的主观愿望，对战争的性质和宗旨加以理想化的虚拟，把原本是残酷、可怖的战争改造成为合乎自己政治理

念的事物，进而批判、否定现实中的战争活动，但现实中残酷的军事斗争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在具体论述中注意、肯定兵事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这是其追求理想境界与现实矛盾的必然现象。

儒家在构筑战争的理想境界方面具体的标志是系统地提出了“义战”的理论。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也积极推行“义战”。进而认为“义战”是顺乎天道而应乎民心，因此必定是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甚至根本无需通过真正的战斗。并据此加以演绎，得出逻辑性的结论，从事“义战”，就是用兵的最理想境界，是任何战争指导者都应该执著追求的战争宗旨。至于该通过何种手段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儒家人物是不曾也不屑于从军事操作层面去考虑的。墨家则主张以兼爱、德义服天下，提倡“非攻”，与儒家的义战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不论是儒家，还是墨家，他们所倡导的“义战”纯粹是自己理念中的虚构与假设，属于理论上的概念表述，是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只是墨家在构筑用兵理想境界的同时，也注意讲求战争实施方面的可操作性问题，这反映为其具体的“救守”理论。《墨子》有《城守》诸篇，讲的是如何救守的有效工具与手段，在以守城为中心的防御作战理论方面，提出了重要的见解。这说明在墨家那里，构筑用兵理想境界与讲求实战操作功能是并行不悖的，在这一点上，墨家的军事思想要比儒家全面和辩证。

道家“不以兵强于天下”，以“无为”、“不争”的方式来达到战争上的全胜，做到“虽有甲兵，无所陈之”，陷足于主观臆想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在先秦诸子中与兵家较为接近的是法家。

法家学派站在纯粹实用的立场，主张运用各种行之有效

的手段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同兵家是一致的，更注重掌握驾驭战争的实际要领，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讲求具体的操作方法之中。法家学说的特点是注重实事，讲究效益。它对构筑虚无缥缈的用兵理想境界毫无兴趣，只关心战争准备与实施上的可操作性。这既是其政治立场的客观反映，也是其学说特点的必然要求。虽然比较于儒家和道家，它关于作战指导的见解还是丰富和深刻的，尤其是《管子》一书，在这方面更有精辟的言论，值得重视。但是法家毕竟不是专门的军事理论家，因此其对具体作战问题的论述相对显得比较单薄。

由于存在着构筑理想境界与讲求操作功能两种不同的倾向，这就形成了点的深化与宏观的把握、面的兼顾与微观的操作之间的差异。

儒、道等派虽忽略具体的军事学术问题，从总体上看，其军事思想的基本特点之一，乃是点的深化，即战争观理论的高度成熟，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高度重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深刻认识到民心向背与战争胜负的关系，提出了“取信于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等一系列光辉命题，从而在总揽全局的高度，为古代兵学解决了政治原则问题，使古代战争观理论在哲理上获得了抽象的升华。

兵家乃至法家以讲究可操作性为特征，必定要努力包容兼顾军事理论的各个侧面、各个层次，构成比较系统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以便于在实践中加以操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面的兼顾与微观的操作方面明显高出于其他学派。

## 兵家与先秦诸家的渊源

2 兵家是先秦诸家中一个十分有影响的流派，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先秦典籍中，兵家思想不但与诸子及其他各家相互渗透、交融，而且错综交织。纵观中国古代兵家的兵法思想，尤其是先秦时期，始终不是孤立的、封闭的流派体系，诸家思想相互滋润、影响，共同形成了多元的、生动活泼的大文化体系。但任何时代的军事家都是有其政治倾向的，没有无政治色彩的军事家，换言之，也没有无政治倾向的兵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秦的兵家可划分为儒兵家、法兵家、道兵家、墨兵家、杂兵家、纵横兵家等。

也许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此划分，兵家还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流派？

这里需要辨别的是：这种划分的前提是兵家，而诸家只是其政治倾向而已，而且这种政治倾向也往往不是一家所能全部概括的。这正如孙武兼通儒法，但其一生所致力于的却是兵学，所以他只能是兵家而非其他；又如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的著作《商君书》中部分篇章诸如《农战》、《更法》、《开塞》等也讨论了兵学方面的内容。但其侧重点显然是政治，因此，商鞅归入法家，而非兵家，但这并非否认商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与之异曲同工的是吴起，他兼法家与兵家于一身，但其著作《吴子》以兵学为主，故归入兵家而非法家。另一类型是荀子，只是谈兵而已，集中反映在《议兵》篇。就先秦兵家主流而言，大体上可划分为三大类，即儒、法、道兵家，其外化突出的特征分别为修德、尚法与求巧。

### （1）兵家与儒家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直接用“外兵内儒”来概括，应该说，这种形容是比较贴切

的。

在先秦有代表性的兵家著作中，仁义、德治等儒家的基本概念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多次引用和强调。《孙子·计》将影响战争的核心要素概括为道、天、地、将、法等五种，其中，名列榜首的就是“道”。这里的“道”指道义。张预在注解中特别强调：

以恩信道义抚众则三军一心，乐为上用。①

可见，孙武的“道”和孔子的仁德是暗合的，两者是相互潜通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孙子兵法》里把商朝宰相伊尹和周武王军师吕尚（即姜子牙）作为“背人从道”的典型来举荐，说明了他所运用的道与孔子说的仁德之政大体一致。同时，孙武更在多处强调和使用“仁”这一儒家代名词的术语和概念。仔细分析孙武所使用的“道”与“仁”的内涵，其与孔子所强调的仁德和道义，虽然使用的范畴和界定的领域有所区别，但本质上是相通的。其实，在先秦兵家诸多著述和论断中，《孙子兵法》对于仁、道的使用并非孤例，先秦时几部主要兵书都把仁义、德治这些儒学的基本概念作为用兵的信条。《吴子》中的“文德”，《孙臆兵法》中的“义”，《尉缭子》中的“道胜”和“人和”，《司马法》中的“仁本第一”等，不仅多次使用，而且都把仁、义和道置于显赫的位置上。

尉缭曾从辩证分析的角度谈到文武的关系。

兵者，以武为栋，以文为植；以武为表，以文为

① 《孙子十家注·计》。

里；以武为外，以文为内。能审此三者，则知所以胜矣。<sup>①</sup>

这也可看做是兵家与儒家关系的绝妙注脚。

实际上，在古人的眼里，兵家与儒家也是有相通之处的。班固在修《汉书》时，将《司马法》列入到礼经类，显然考虑的是书内的具体内容，而非简单地从作者的身份、流派来划分的。从而也从另一角度验证了兵家与儒家兼通的论断。应该说，真正地理解先秦兵家，应该不是专攻杀伐，不尚文德的片面观点，应该是内修文德，外事攻略的辩证统一。同样，儒家也不是从根本上排斥战事，而是强调区分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战事，并进而探求其大道大本。诸如孔子提出的“慎战”、“尚谋”思想，都应看做是对中国兵学文化的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的兵学与儒学是相通相融的，不能简单片面地认定兵家是杀伐废德，儒家是修德弃兵。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兵家与儒家是相辅相成、水火相济的，有互补相长的妙用。

## （2）兵家与道家

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应该肯定的是：道家尤其是其间所包括的丰富的哲学思辩色彩，极大地充实了中国兵家思想，不仅成为兵家诡道思想的渊源所在，更使其逻辑思辩体系逐渐完整，为其重权谋、讲权变、谋造势的“智”学提供了丰富的哲学理论和依据，而且为培养先秦兵家处变不惊、处逆不屈的抗拒逆境的强韧的精神内核提供了思想力量。但也要看到，道家的确是主张去兵的，而且其核心是无

<sup>①</sup> 《司马法·兵令》。

为。关于去兵最明显的论断：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①

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②

即以兵逞强会引起冤仇相报，难以善其后，如果以兵称雄天下，必将失去天下。对于无为的典型论断：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③

字面上包含的意思十分明显，就是以无为的姿态去作为，以息事宁人的方式去做事，以恬淡无味当做味。说到根本上，就是提倡无为无事。所谓“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④。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⑤

虽然道家确系主张无为，这是事实。但实际上，在老子这番论断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将“有事”寓于“无事”之中，“有为”寓于“无为”之中，相反相成，有着深邃的文化底蕴。正如韩非子所说“皆用其能，上乃无事；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其间所包含的

① 《老子》 30章。

② 《老子》 31章。

③ 《老子》 63章。

④ 《老子》 7章。

⑤ 《老子》 57章。